

《第二十条》用“憋屈感”刷出“存在感”

电影《第二十条》近日在影院热播，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和其他几部春节档电影相比，《第二十条》的宣发力度并不算大，尽管有张艺谋导演坐镇，还有雷佳音、马丽、赵丽颖等知名演员的加持，但本片并不是一部追求“合家欢”的传统贺岁喜剧，而是一部以人文关怀为底色的现实主义电影。该剧除了对刑法中“正当防卫”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外，检察官所具有的悲天悯人情怀、刚直不阿精神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正当防卫对每一个普通人都很重要

在现实生活中，什么样的防卫才是“没超过必要限度”、什么样的情况符合“紧迫性”，一直存在争议，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公民的正当防卫空间被压缩得有些“逼仄”。事实上，如果正当防卫门槛过高，不仅会制约公民见义勇为以及自我救助的积极性，也会危及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的人身安全。本片所聚焦的，正是这个受到全民关注的话题。

如果说法律条文和案例介绍是理论性的，那么电影的影像则是鲜活、生动的。公众在网络空间的讨论虽然总是热烈，但是如何看待正当防卫的作用，终究还要把它放置到日常生活的语境来讨论。这也正是《第二十条》的意义所在——正因为观众在大银幕上目睹了王永强一家因为悲愤而流出的眼泪，见证了韩明遭受冤屈后的愤愤不平，看到了韩明在劝导张贵生认罪后的矛盾心情，人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正当防卫作为一种司法实践，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较之法律条款、司法理论，电影

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对生活画面更全面的展示。在本片中，不管是因为生活、工作而焦头烂额的主人公韩明，坚持要为王永强伸冤而屡遭挫折的吕玲玲，还是表面冷漠固执实际内心柔软的田副检，都在用自己的不同方式追寻公平正义。

电影用生活化的方式描述他们的喜怒哀乐，让大家了解到司法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辛苦和不易。也因此，如何去体量司法机关基层工作者的难处，又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大、更宽容的空间，让他们去建造连结法律与百姓的桥梁，也是电影留给公众的思考题。

可以说，电影院里观众感受到的每一份“憋屈”，正是《第二十条》在这个春节档里的“存在感”。当韩明终于在听证会慷慨激昂地說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刑法里的 56681 字都是在诉说公平正义”时，观众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放。这并不是流量作品所追求的“爽感”，而是公众与社会价值、法律价值的共鸣。

公平正义既需要检察官、法官，更需要律师

《第二十条》中的检察官确实尽到了客观义务。检察官客观义务，作为检察官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已经为检察官法第 5 条所确认：检察官履行职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检察官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既要追诉犯罪，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基本含义，是检察官应当抛弃单纯一方当事人（追诉者）的立场，对不利和有利于被告人的事项一律注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既要除暴，也要安良”。电影中所塑造的韩明、吕玲玲检察官的形象，无疑是检察官客观义务的代表。

艺术来源于生活。电影中的韩明、吕玲玲检察官是人们对司法现实的一种美好期许。人不一定要做大官，但一定要做无愧于良心的事。

这部电影给不少人一种错觉，认为检察官能够“包打天下”，无所不能，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似乎当事人遇到善良和客观公正的检察官，他们就无需再聘请律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实，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刑法第 20 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常见的主体是律师。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其毕竟是追诉者角色，获得定罪是其职业目标。当事人遭遇冤屈时，委托律师，国家能够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能够被司法机关采纳，才可能真正防范冤假错案发生。律师是中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此，公平正义的实现既需要刚正、清廉、品格高尚的检察官、法官，更需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律师。综合自红星新闻、正观新闻等

马九月整理

每位游客都应得到傅园慧式“待遇”

□ 李英锋

据多家媒体报道，2月17日，游泳运动员傅园慧在长白山发博求助：咱们包了车现在被勒索了，半路加钱让我们买票；我们不同意，他不开车了咋办，我要不要报警啊！傅园慧发多条评论称，“司机想把我们留半路高速上”，“他不知道我是谁”，“在去雪岭马拉爬犁的路上”。此事引起网民关注，2月17日10时56分，傅园慧再次发文：感谢网友们的关心，吉林文旅部门已经第一时间介入，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当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傅园慧的求助，高效解决问题，令人欣慰。但欣慰之余，不少人也会产生“比较式疑虑”——普通游客的网络求助甚或投诉举报也能有如此高效、坚决的反应吗？

人们关注傅园慧求助事件，也是在关注自己的旅游维权境遇。评判一个地方旅游市场环境的好坏，一看旅游侵权行为、纠纷的发生率，二看相关监管部门处理游客投诉举报的诚意和效能。旅游侵权行为高发以及相关部门不拿游客反映的问题或投诉举报当回事，都是旅游市场环境的减分项。一个地方出现旅游侵权行为，或者游客反映了旅游侵权问题后，文旅、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只有在常态长效机制下做到平等重视、

快速反应、公正处置、及时反馈，才能向旅游形象和旅游市场环境注入正能量，才能给游客吃下维权定心丸，让游客树立信心，放下顾虑。同时，有关部门的积极介入、有诉必查、有查必果也向旅游经营者、旅游从业者释放出震慑、警示信号，能倒逼旅游经营者、旅游从业者打消违法侵权投机心理，增强自律意识，敬畏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规范旅游经营、服务行为。

比之花样宣传“摇人”，重视游客的投诉举报或吐槽，给出负责的态度和反应，更显诚意，更加具体，也更容易打动游客的心，进而影响游客的消费选择。希望吉林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帮助傅园慧解决求助问题的高效反应成为旅游维权的范本，期待着每一名无论以何种方式反映问题的游客都能得到傅园慧的“待遇”。在事前、事中、事后等环节尽全力维护每一名游客的合法权益才是最好的“宠客”方式，才宠到了游客的心坎里，才能为旅游吸引力奠定最坚实的支撑。如果一个地方或相关部门在不知道“傅园慧”是谁的情况下，也能对“傅园慧”的“求助帖”快速反应、严格处置，那么，这个地方的旅游市场环境就具备了达标的关键要件。

取消“基层开具证明”该是时候了

□ 郭元鹏

据《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东五村村民马胡赛尼夫妇，今年打算带孩子到西宁生活，牵扯到转学和异地入学问题。趁着返乡过年，他找到村里开转学证明。“转学证明现在不需要由村级组织开。全省联网后，可以在教育部门网站查询学生信息。”村党支部书记韩永林解释。原来，青海已集中取消 177 项原本需由基层开具的涉及群众办事创业证明等事项。

青海省集中取消了 177 项原本由基层开具的各种证明之后，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以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东五村东五村为例，这个村全村 123 户，有 1/5 的村民外出开拉面馆，此前需要村里开具的证明不少。如今，“减证便民”做到了村民心坎上。尤其是，这些外出人员，以往开具“学生异地入学”都需要村里出证明，而如今再也不需要了。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证明开具，却着实增加了基层组织的工作量，成为外出村民的障碍。

取消“基层开具证明”也是治理形式主义的最好证明。为什么说让“基层组织开具证明”属于形式主义？这是因为，目前已经实现了各种数据的互联网管理，网络时代，最好的证明，并不是让基层组织开具证明，而是大数据的查

询。从外出村民学生的异地入学而言，只需要在大数据上查询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符合异地入学的标准，而且所有信息，所有数据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村里的证明”属于多此一举。

2023 年 7 月，青海省出台《青海省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具体措施》，制定《村级组织依法履行职责工作事项清单》《村级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村级组织减负事项清单》“三张清单”，推动村级组织减负增效。这种取消“基层开具证明”的做法具有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给基层组织减轻了压力。不再需要开具“没有意义的证明”了，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可以腾出时间去做“该做的事情”；其二，减轻了群众办事的繁琐。外出人员创业等等，需要各种各样的证明，今天需要这个证明，明天需要那个证明，还需要返回村子去开具，来来回回的奔波辛苦不说，还耽误了很多时间。

眼下是网络时代，各种数据已经采集完成，只需要让大数据实现真正的“群众少跑腿”甚至是“群众不跑腿”。取消“基层开具证明”没有任何障碍，是时候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共享了。基层负担减轻了，群众办事方便了，何乐不为？